



甘肃人民出版社

# 邓小平生平研究史

周一平 著

周一平 著

# 邓小平生平研究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邓小平生平研究史 / 周一平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26-03071-3

I . 邓... II . 周... III . 邓小平 (1904~1997) -  
人物研究 - 历史 IV . A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75352号

**责任编辑: 刘明易**

**封面设计: 徐晋林**

**邓小平生平研究史**

**周一平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48 千**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26-03071-3 定价: 25.00 元**

本书由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目 录

## 第一章 绪论：邓小平生平研究综论

一、新民主义革命时期 .....	(1)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 17 年 .....	(10)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	(12)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	(20)

## 第二章 20 世纪 80 年代

一、概说 .....	(26)
二、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略》 .....	(28)
三、杨鹏翔：《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 .....	(37)

## 第三章 20 世纪 90 年代

一、概说 .....	(64)
二、宗峻：《总设计师》 .....	(65)
三、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	(86)
四、袁永松等：《伟人邓小平》 .....	(121)

## 第四章 2000 年以来

一、概说 .....	(131)
二、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	(132)
三、阎润鱼：《共和国历史上的邓小平》 .....	(173)
四、宋海庆：《邓小平：富有魅力的政治家》 .....	(183)

五、钟文等:《百年小平》 ..... (196)

**第五章 结论:邓小平研究应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一、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人物 ..... (205)  
二、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 (207)  
三、坚持“双百”方针 ..... (209)  
四、面向世界 ..... (210)  
五、加快资料建设 ..... (212)  
六、完善学术规范 ..... (214)  
七、坚持实事求是 ..... (216)

**附录:邓小平生平研究主要著作目录** ..... (219)

**后记** ..... (227)

# 第一章 绪论：邓小平生平研究综论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 记述邓小平经历，对邓小平进行研究，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文字，是法国警方作为情报写的关于邓小平的简历及其在法国活动的情况

邓小平 1919 年 9 月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1920 年 7 月毕业后，同年 9 月 11 日即在上海乘法国邮轮赴法，10 月 19 日抵达法国马赛。在法国，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 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 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 年开始从事职业革命活动。1924 年下半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 年成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这时邓小平在法国的革命活动已受到法国警方的监视。现在法国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报告：1925 年 7 月 2 日记录，“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下午在布瓦耶街 23 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七十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八人发言，其中邓希贤（邓小平）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1925 年 10 月 25 日报告：“昨天 20 点至 21 点 30 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 25 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邓小平）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1925 年 11 月 16 日报告：“国民党于 11 月 15 日 15 时至 17 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 23 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 47 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歧，会上陈希（音）等 11 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sup>①</sup>1926 年 1 月 7 日报告：“据本月 5 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 1 月 3 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 23 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人

---

<sup>①</sup>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128~130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将军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 1 月 3 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 年 7 月 12 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 1925 年 8 月 20 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 3 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 1920 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 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 3 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件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sup>①</sup>1926 年 1 月 8 日法国警方搜查了比扬古尔的三家旅馆，并报告“……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在卡斯德亚街 3 号旅馆的 5 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 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 Ping Suen Yang 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 7 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sup>②</sup>以上这些文字，记载了邓小平在法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情况及简历，是真实的，只是这些文字的立场观点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些文字原文都是法文，是法国人写的，即这些文字是法国人研究邓小平的文字。也是目前为止能看到的最早的研究邓小平的文字。特别是那篇简历，相当于是邓小平的一个小传。

<sup>①②</sup>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132~133 页，133~134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1926年1月7日，邓小平与一批中国同志一起离开法国去俄国

邓小平到俄国后，先进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邓小平是第七班的党组组长。1926年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写过个人的经历，其中写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sup>①</sup>“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感觉到我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sup>②</sup>这大概是邓小平写的第一个自传（这个自传还有一些内容，现只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看到一些片段），是邓小平自己对自己的研究。叙述了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莫斯科期间，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给邓小平做过一个鉴定，内容主要如下：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发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发同志们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sup>①②</sup>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112页，150~151页，北京，中文文献出版社，1993。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成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时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sup>①</sup>

这可以视为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对邓小平的一种研究，客观反映了当时邓小平政治上的基本情况。1926年邓小平的自传及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鉴定，都是研究邓小平的文字，是中国人（也包括邓小平自己）研究邓小平的较早的文字，而且是客观真实的。这两篇资料，对于今天研究邓小平是极有价值的。

### 3. 邓小平 1926 年底从前苏联回国，1927 年 2 月到西安

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1927年6—7月间到中共中央工作。至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1929年12月，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0年2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创建了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

迄今为止还没发现1926年底到1931年间有邓小平的完整的传记文字。当时记述邓小平在冯玉祥军中、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文字也没有发现，而关于邓小平在广西的经历，则有一些片断的文字记述。

如1930年3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第二期发表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一文，就涉及邓小平到广西后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报告》（可能是邓小平所作，详《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23页）中谈到：“广西军事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军委还未建立……第二个时期是××同志去把军委建立，这时才开始有计划的注意士兵运动，但依然是很少的发展，虽然又有计划的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惜都因语言不通而得不到好的效力。第三时期……第四个时期……决定正式成立为红军第七军，组织红军前委……前委成立时已将工作大纲议定……”<sup>②</sup>这一部分有一篇《补充报告》（为邓小平作，详

①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149~150页。

② 中共广西区委党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

见龙平平主编《邓小平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第 128 页），谈到：

(一) 转变路线问题——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内)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到百色后，我们即公开坚决反国民党，号召工农兵组织政府，在十月革命纪念节那一天我们曾召集了盛大的纪念会，我们曾在这会中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给反革命以很大打击，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须)要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动，但这次发动并不是上级的命令，还是经过士兵们及大会来决定的……反富农的路线在右江已执行，事实上当地的富农已经反革命了……不过现在右江的农会还有许多是在富农的领导下，还须(需)要我们艰苦斗争——总之在右江方面发动工作的准备都(做)好，以后如能在各方面的策略运用得好，将来前途是很可乐观的。(二)左江的情形——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住)了两天，会着×××等二十余(位)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以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总之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面，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sup>①</sup>

以上这些文字既反映了邓小平的实践活动，也反映了邓小平的一些思想。

又如《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1930 年 3 月 2 日) 提到：“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sup>②</sup>“红七军前敌委员会指定小平、昭礼……七人组织之，小平为书记……军应设政治委员，指定小平为军部政治委员。”<sup>③</sup>

又如《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1930 年 4 月 20 日) 提到：

小平同志回去时，带着中央很详细的指示。自小平同志达到后，你们的确相当(认真)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但是照最近报纸的消息

<sup>①②③</sup>中共广西区委党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179~180 页，218 页，248 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看来，你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尚有不够的地方，如：第一，你们没有能很快的集中力量，根据中央指示发展的路线，向着柳州、桂林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的北江西江发展，并且你们曾有进攻南宁的错误计划，久留左右江卒至被敌人将你们切断；第二，最近报载你们内部发生问题，即是冯飞龙叛变，果然如此，则你们对土匪运动的策略仍有执行得不正确，对土匪领袖没有能坚决的执行解决……<sup>①</sup>

又如徐振农（又名涂镜吾，曾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1942年被捕叛变）《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1930年5月）分为：“一般的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的趋势”、“红军的情形”、“苏维埃的情形”、“地方党部情形”、“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龙州失败情形”、“几个意见”八个部分。其中记述的很多事，都与邓小平直接相关，有的地方则指名道姓记述邓小平。如第二部分“红军的情形”中谈到“……不久，邓斌（邓小平）同志由中央返到龙州（大约是二月八九日，记不清），即由邓斌同志召集特委、军委联席会，将他在中央讨论（的）对左右江工作的策略，曾作几次整个的详细的报告。并根据他所得到龙州同志的报告和观念，指出左江各方面工作，如党、革委会、红军、工会、农会等，都没有斗争的路线，都没有抓住中心工作。特别是革委会完全没有做到（好）接近群众的工作，只是忙于公文机关的工作，甚至连机关工作也做得不好。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决定了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肃反斗争、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红军发展方向等问题。并指出进攻南宁是错误，马上电话驮芦制止，召回何世昌同志，率队回龙州。并电告右江，左右江应该很快的汇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过境进展，以期与四军汇合而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左江红军，于二月二十三、四日邓就职为政治委员后，即由邓率一纵及二纵之一连，由驮芦向靖西进展……”<sup>②</sup>第五部分“职工运动”谈到：“龙州各工会，于转变后，即召集工人代表大会……会议凡三日，第一日由邓斌同志报告政治（代表政治部参加）……”<sup>③</sup>

又如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1930年8月22日）是汇总邓小平等人的口述而成，其中邓小平口述的内容有：“邓同志抵龙州时，左右两江红军准备出发向南宁移动，察内部的改造未完备，和地方党的幼稚与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不实际，即停止了其进行，并拍电七军停止行动，一面积极改造八军纵队，将第一纵队旧的基础改造完备，即向靖西方面游击，以消灭靖西的反动势（力），以利左右两江的联络”。“……自邓同志到右江后，一切已纠正，积极发展雇农工

<sup>①②③</sup>中共广西区委党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258页，296页，306页。

会，引导雇农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对于一切口号(的)提出及各种事宜，皆依中央路线，在事实上证明中央路线正确”<sup>①</sup>。

又如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1931年3月9日)分以下几个部分：

一、七军成立前准备工作；二、七军转变的概况；三、右江十县政权的建立与七军在隆安的失败；四、反攻敌人的准备及其结果；五、桂、黔一带游击战争；六、重回右江后事变；七、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与河池全军改编；八、三次战争中党的争论问题；九、七军现状。

其中大部分的记述都与邓小平直接相关，有的地方指名道姓记述了邓小平。如提到：“至河池适邓斌同志从东兰出来(邓同志于三月前从中央至八军后到东兰，七军大部已出走)，带来中央指示要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前委接受此种意见，乃决定回师右江，三个月后才向外游击。”<sup>②</sup>

阎衡《关于第七军的报告》(1931年4月4日)其中的记述也是与邓小平直接相关的。其中提到：“攻城(案：连州)第三日……李明瑞、邓斌两同志都觉得没有把握，于是日薄暮撤退(在连州找到所谓边特)。第二日出发到西江，在此地分别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又召集一个干部会议，讨论七军行动问题……在会上邓斌同志报告说：据龚鹤村同志说，梅花、太平、杨家一带现已经集合一千多武装准备影响我们，那一带有很好的农民基础……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开始讨论就有两方面的意见……这两方面意见争论之下，行动问题这一天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日又继续开会，龚同志从报告梅花等处的情形，说明梅花等处并不是如邓斌同志说的那样好……”<sup>③</sup>

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上海给中央写了《七军工作报告》，分以下部分：一、八军的经过；二、七军的经过；三、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四、个人的回忆。全文15000字左右。这个报告叙述了邓小平广西至赣南的经历，也反映了当时邓小平的一些思想。如第四部分主要总结了教训，谈到：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的感觉……(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五)七军是和平转变来的，转

<sup>①②③</sup>中共广西区委党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328~330页，371页，387~388页。

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固然当时是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的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九）敌军士兵运动作得太少……（十）七军是坚决的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做了不少错误……<sup>①</sup>

从这些教训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的一些思想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思想，如主张反富农路线，是不正确的。这个报告是当时邓小平对自己在广西经历的一个系统的回顾和记述。

以上这些都是研究邓小平的文字，是中国人（也包括邓小平自己）研究邓小平的文字，大多是客观真实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对邓小平在广西的实践活动的记述研究，批评类的文字不多。而对邓小平到江西后的实践活动就有批判性的文字出现了，当然这是当时“左”倾路线对邓小平的批判，是错误的。

1931年8月，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4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因支持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当时党内“左”倾领导的批判、打击，1933年5月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党内的一些文件及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以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名义，点名批判了邓小平。

如《斗争》第八期（1933年4月15日出版）刊登了三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  
一是洛甫（张闻天）《罗明路线在江西》批判了会（昌）寻（乌）安（远）的“罗明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

二是《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1933年3月31日），其中提到：一、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二、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三是罗迈（李维汉）《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1933年4月4日），其中说：“过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不久以前在党中央局报告和讨论了

<sup>①</sup>中共广西区委党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409~411页。

三县工作以后，作了一篇《会寻安工作的检查》……我们试来检查一下邓小平同志的‘无情揭发’与‘充分的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只是写了一大篇糊涂哲学，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难道还不明白吗？”“邓小平同志也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在这里又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一次！”“这里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没有准备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给纯粹防御路线的创造者（邓小平同志）以无情的揭发。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而恰恰相反的骂了一顿群众，骂了一顿党员和各级党及苏维埃的负责人。自然更谈不上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作深刻的揭发……邓小平同志在会寻安的领导方式，那更是完全重复立三路线的领导方式。”……

《六大以来》（上）除了收入《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洛甫《罗明路线在江西》以外，还收入了《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1933年5月4日），其中谈到：

（一）红军学校全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听了罗迈同志的报告之后，一致同意中央局对于江西党内罗明路线的揭发，以及对于江西罗明路线创造者与执行者的处置。（二）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塞维克的队伍。（三）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在革命猛烈发展的面前悲观失望，非但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这是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政纲，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根据这一机会主义政纲，形成了反党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sup>①</sup>

还收入了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组织》（1933年5月6日），其中说：

无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他们都曾经是立三主义的坚决执行者。可是他们在四中全会后，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和派别的立场，在反立三路线和反右派的斗争上，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那时，邓小平在上海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掩藏在两副面孔的下面，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一点也没有奇怪的，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大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他对于谢唯俊、毛泽覃公

<sup>①</sup>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360页，北京人，人民出版社，1981。

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的活动默不作声，对古柏仅作了一次外交形式的批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邓小平一向在进行研究反党的派别活动……事实上正因为邓小平在四中全会后，还在坚持自己立三主义的错误，所以对于真正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和新的中央采取反对的立场，不过是掩藏在两面派的形式之下大下力气罢了。所以他当时对反右派的斗争，采取了“没有关系”的态度（邓小平这次还说，反右派与他没有关系）。邓小平一直到总结会议，还没有放弃他的派别活动，正是因为他还在坚持自己罗明路线的错误，不能有别的解释……<sup>①</sup>

这些对邓小平的批判文字，也可以视为是研究邓小平的文字。不过这些研究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不久，特别在遵义会议以后就逐步被否定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35年以后，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已较此前大得多，但有关邓小平完整的传记文字还未见发表，有一些研究邓小平的文字，但大多是片断的非专题性的。如1944年莫文骅写成《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雷经天写成《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对创建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有较为全面的记述，都涉及邓小平，但没有专门记述邓小平，记述邓小平只是片断的。又如1944年10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收录了《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一文，1945年3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都介绍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129师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史事，但其中没有专门介绍邓小平的文字。

总之，新中国建立以前，尽管已有一些研究邓小平的文字出现，但完整的传记文字还没有发现。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先是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

①中共中央书记处：《六以来》（上），365页，人民出版社，1981。

1952年7月调北京，8月到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sup>①</sup>在当选为总书记后，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专管党务，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仅负责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去做，抓全面工作，发文用中央名义。<sup>②</sup>从此，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邓小平当了十年的总书记，主持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各方面建设，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

尽管邓小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袖，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对领袖人物的传记类研究大多集中在毛泽东身上，几乎只有毛泽东一人的传记类书有出版，而其他领袖人物的传记类书很少出版，邓小平的传记类书没有出版，只是某些军史、革命史的书或回忆录中提到了邓小平，如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档案馆筹备处编《老战士回忆红七军》、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革命回忆录》、莫文骅著《回忆红七军》、谢扶民著《转战千里》、欧致富著《右江风云》等。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出版的曲齐武著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等。1957年成立的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任主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在1961年编出了《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两部草稿，1962年又编出了附件之一《战例选编》和附件之二《资料选编》，但都没有公开出版。此外，媒体也报道过邓小平的一些活动，但不多。以上这些文字都涉及到了邓小平，但并非是系统的邓小平传记。

如果宽泛地看邓小平研究，那么某些评论也是一种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论就有不少，如从已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多次赞扬。如第一册中《转发邓小平关于整风、春耕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0年5月13日）提到：“兹将邓小平同志五月十一日来

<sup>①②</sup>阎润鱼：《共和国历史上的邓小平》，68页，7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